

新观察·文体探微

以存在之诗写人间情怀

——学者散文的审美品格与精神向度

□高旭

作为当代散文发展历程中颇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学者散文”凭借其知性的审美风格与深远的精神向度,成为20世纪散文史上的独特存在。长期以来,学界对“学者散文”的定义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创作主体日益繁盛、创作趋向愈发多元,其边界也在持续拓展。

学者散文的创作主体多为从事专门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依托于学者的身份与立场,即以“知识者”的身份从事创作,将自己的专业视野、学识积累、思想方法等带入散文创作中。学者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现场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在审美范式、情感表达与主体精神挖掘等方面均实现了显著突破。

审美取向:知识与理性交融

知识性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其他散文类别的最显著特征,其核心在于以知识的密度与抽象的思辨为行文脉络,将学识、智慧与思辨熔于一炉。正如谢冕评价金克木的散文时所言,其“最主要的特色乃是这种学者的气质和秉性”,能够通过轻松而不板滞的文笔,在散文中贮存和承载了丰富的知识和学养。由于创作者多为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自身研究领域熟稔于心,写作中会自然引入专业知识与学术术语,却能做到引证驳杂而不显枯燥,尽显学者扎实的基本功底。

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带入散文,如葛剑雄的文章展现出深厚的历史地理学素养;赵园作为乡土文学研究专家,其散文多聚焦漂泊与乡土的眷恋之情;刘小枫的文字则常蕴含哲学思辨,涉及海德格尔、洛维特、科耶夫、柏拉图等西方哲学家。经济学家樊纲的文章探讨社会现象时,惯于以通俗语言阐释复杂的经济学知识,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需求”“供给”“产出”“风险”等经济学术语相联结。陈平原的随笔涉及不同时期作家掌故与文献典籍,才学纵横。仅是一篇关于“炒栗子”的文章,就能旁征博引,展现出丰富的知识:“不过,明知生食栗子能健体治病,世人似乎还是更倾向于‘熟食’。这点,清代学者郝懿行已经注意到了:‘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觉其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不仅仅是‘熟食’,作者还排除了煎煮炖等各种制作方式,唯独推崇一‘炒’字。如此选择,大有深意。”不仅梳理炒栗子的源流,且引用不同时期学者关于栗子的议论,由简单的对栗子吃法的探讨上升至对传统饮食文化及文明意涵的深入挖掘。文章可读性强,将枯燥的知识写得颇有生气。

理性可视学者散文的又一特征。学者散文中的理性精神,是运用理性思辨来统摄艺术直觉。由于长期进行学术训练的缘故,学者散文中的逻辑更加严谨,具备了更多逻辑自觉和理性推演过程。作家们在文中多有议论,以辩证思维对世界进行认识、对历史进行反思、对文化进行批判,对人生进行追问,形成具有现代理性精神和深度人文关怀的审美品格。周国平在《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一文里,对“死亡”这一命题进行了哲学家的缜密推演,从死亡的焦虑开始,到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层层递进。作者罗列了古今中外众多知名思想家的诸多观点,最后得出了“面对死亡,不再回避,但也不再寻找接受它的理由”这一结论。那么,这一对死亡的思想有意义

◆作为当代散文的重要分支,学者散文的创作主体多为从事专门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其审美特质以知识与理性交融为核心,大多秉持民间立场与深切人文关怀,聚焦公共性议题,彰显知识分子群体的责任与担当,展现贴近大众的普遍关怀

◆当算法试图消解一切意义时,学者散文的思想性,反而成为一种无法被算法批量生产的独特经验。学者散文的未来或许在于:它既是抵抗虚无的“存在之诗”,也是重构意义的“技术伦理”。我们仍需用学术的理性与文学的激情,守护人类精神的星空

吗?在作家看来,透彻地想过了死亡,也就获得了“死亡的自由”。

学者散文中的理性,还体现在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上。情感是散文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应以何种方式表达情感?情感又该如何提炼?若情感尺度把握失当,文章极易陷入煽情、滥情的窠臼,或充斥着虚假的情感。通过运用理性节制抒情,对情感进行过滤与提纯,能够有效增强散文的情感张力。学者散文的情感结构,并非情绪的直接袒露,而多表现为抒情的克制,其对个人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往往更为含蓄蕴藉。在季羨林1992年所著的《牛棚杂忆》中,我们读到的是对“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真实直面的冷静叙述与沉着反思,字里行间甚至还透出面对苦难时的调侃与纾解。这种书写无疑赋予了学者散文思想的厚重感。

知识和理性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知识而无理性,散文就会沦为知识的贩卖和炫耀;只有理性没有知识,散文则会陷入空洞的说教。余光中说:“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性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这里的“见解”就是作家的理性精神,是作家以主体之智慧和思辨对纷繁事物的洞察与揭示。这些知识和理性都是建立在作家强烈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上的。唯有如此,散文才显露出其知识的厚度与理性的深度。

历史语境:身份焦虑下的主体性重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散文承担了文化启蒙与思想启蒙的重任,深刻反映出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面对外部危机的选择。洪子诚以“在责任与焦虑之间”来概括学者散文面临的生存环境,揭示了知识分子复杂而焦灼的创作心态。

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与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学生态。大众文化迅速崛起,人文精神渐趋失落,商品化浪潮对纯粹的理想主义造成了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感反而被激发,作家的主体价值意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他们以文字介入时代,通过反思历史重构时代精神,积极应对转型时期的文化裂变。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愈发强烈。这一责任感,既源于中国古代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更延续了近代以来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与公民启蒙意识。季羨林在《九三述怀》中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异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继承了“士”的传统,对所处的社会现实抱有高度的热忱与深切的关怀。“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自了汉,只管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的事情”,而“我们的高知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得学者们在创作时普遍

怀有关切现实问题的意识,正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作家们在创作中普遍具备“问题意识”,所选择的内容也多为公共性话题,较少进行私语化的表达。无论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还是以传统文化为书写内容,抑或是在文中追忆故人旧事等,均是从现实角度出发,饱含着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

学者散文不是躲在书斋里的私语,而是直面转型期中国的现实问题,以理性精神积极介入和反思。如钱理群对“苦难记忆”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自剖,要求人文学者“思虑应该更为深广”:既要从事个体的苦难体验与记忆出发,又不能止于此,还要经历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才能超越于一己的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使苦难真正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这充分体现了学者理性反思的深度。

新时代以来,学者散文在直面社会公共议题时,展现出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张柠的《王寅初复观影记》,写居家观影的经验,虽是观影感受,却时刻呼应当下现实。王彬彬的散文集《废墟与狗》,也是在居家时期创作。其中一篇《抢》,从一次哄抢事件切入,由物资抢夺引申至社会利益层面的争夺,进而深入剖析某些“抢夺型人格”,层层递进,既凸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彰显了深刻的思考维度。

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与失落的人文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以一种自我批判的锋芒走向大众。知识分子敢于直面自身的有限性和软弱性,以散文的形式真诚地进行自我剖析反思,呼吁启蒙话语,重塑启蒙精神,试图重建一种有锋芒、有思辨、有温度的写作。这一启蒙之途,不仅是对民众的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也是对自我的启蒙。

知识分子逐渐从精英主义心态中走出,开始思考建立自身主体性的问题。学者散文即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呼应了转型期知识分子主体性存在的方式。他们一面在文化传统中寻找启蒙者的身份,一面在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对启蒙身份产生怀疑,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场围绕金钱与商品的狂欢已然来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危机感愈发强烈。当昂扬的启蒙主义姿态受到冲击,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找一种更有策略性的表达方式传递价值观念。

对写作者而言,以何种方式坚守启蒙成为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学者们选择退守书斋,以读者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表达“我”的艺术。学者散文的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人格,也就是“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与生命理想,并且从繁复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直抵精神内核。由于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学者散文需要展现出更强烈的主体建构意识和价值立场。这不仅对创作主体的知识、技巧提出了要求,更是对创作

主体健全的文化人格提出了要求。

王尧近年来出版的《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时代与肖像》等著作,在追问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同时,也在探索一种新的人格结构。在《我将他们视为道德英雄》一文中,王尧将费孝通、乔冠华、金岳霖等人的个体经历与历史境遇相结合,借费孝通“人会死,文化是不会死的”这一观点,传达出一种进入历史的姿态,带着反思与审视去触摸历史的肌理。

学者散文中文化人格的深层心理结构,是古典士大夫传统与西方理性启蒙思想双重作用的产物。“作为一种理想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兼具学者的‘超越’与思想家的‘介入’两种秉性。”(许纪霖:《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学者散文更鲜明地体现了“文道合一”的要求,即古人所言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启蒙思想的塑造下,学者散文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与情感,彰显出宏阔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价值重构:在变局中开辟新意

处在现代散文百年发展历程之中的学者散文,体现出了散文创作中的文体嬗变。学者散文本质上属于文学体裁,尽管包含大量议论,但最终目的并非完成严谨的论证,而是追求思想、情感与个体生命体验的融合。其议论与感悟植根于系统的知识结构和长期的学术思考,思辨色彩更为浓厚。

学者散文具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在理念、形式与题材层面均体现出文体自觉。其文体杂糅性与先秦散文源头遥相呼应,彰显出文体生命力。学者为文,多是专业学术写作之余的性情之作,又以理性自觉克制情感,将抒情性与议论性有机融合。这一文体革新拓展了散文的发展格局,更新了散文创作观念,丰富了散文的审美内涵,清晰呈现出散文文体的演变脉络。

学者散文的另一价值,在于重建散文的文化精神,体现的不仅是知识的罗列和生产,更重要的是知识之外的人文关怀。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的有力的表述”,这涉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立场选择。这种将理论关怀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写作,体现了学者散文深厚的精神向度。

学者散文构建的文化精神谱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回应了时代的精神危机。这一审美建构是精神性的,与学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在哀叹人文精神没落的时代,学者散文更显其精神突围之势。它重建了散文的审美品格,形成了一种有深度的写作。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者并未在创作中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人道主义姿态,而是在创作的价值

取向上自觉秉持民间立场。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社会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双重使命,启蒙者自身也在经历自我启蒙。这一时期的学者散文创作蕴含着贴近大众的底层关怀,恰似陈平原所提及的“人间情怀”。这种情怀并非源于“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根植于学者的独立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民间”取向,呈现出日常的生动质感。

学者散文的人文关怀,间接呼应了“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人的文学》中提出的“个人主义的人道本位主义”,将个体从封建礼教纲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凸显了对“人”的觉醒的重视。“人间本位”,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立场而言的。学者散文对立场的坚守,本质上是对一种精神出路的探寻。学者的民间关怀,正是以在场的姿态重建人文精神,对个体尊严与生存价值的确认,对民间理想价值的发掘、对历史与苦难的自觉承担,以及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注——这些现世关怀共同构成了学者散文厚重的价值旨归。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热度与喧嚣之后,学者散文逐渐走向沉寂。新世纪以来,散文创作主体空前繁荣壮大,创作题材更加多元,也出现了许多个性化的表达文本。社会文化的转型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巨大转型。

在这一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创作与接受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在坚持思想性与深度的同时,如何与大众形成即时共鸣?如何借助新媒体载体实现有效传播?如何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如何保持对公众发声的立场?尤其是近两年关于新大众文艺与大众文学观的诸多讨论,实则可以为学者散文提供反向的思考与对话视角。

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化普通劳动者,他们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经验,强调写作的自发性,打破了传统写作的门槛与规范。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互为参照,其文学创作都与真实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在数字媒介深刻影响的当下,学者散文或许也可以借鉴与创新传播方式,在变局中开辟新意,找到与大众即时共鸣的途径。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中重拾对细节的关注和洞察,依托日常生活场景,探讨当下热门网络话题和社会现象。另一方面,更应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以“不离日用常行内”的在场姿态与“启蒙情结”的现实关怀,在转型时期开辟新的创作空间。同时,学者散文也应持续吸纳新的思想与观念,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文化建构,不断拓宽题材领域,将视角延伸至生态、伦理、科技等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及新兴话题,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时代下的多元文艺产品愈发凸显出“即时性”与“速朽性”的特点,学者散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现象。当“知识”的获取渠道越来越便利,当人工智能可以任意调出典故,学者散文的思想性,反而成为一种无法被算法批量生产的独特经验。因此,学者散文的未来或许在于:它既是抵抗虚无的“存在之诗”,也是重构意义的“技术伦理”。当算法试图消解一切意义时,我们仍需用学术的理性与文学的激情,守护人类精神的星空。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助理研究员)

短评

触摸土地倔强的表情和炽热的体温

——读傅菲散文集《人间珍贵》

□江子

傅菲的散文集《人间珍贵》相较于他的其他作品呈现出诸多新鲜气质,称得上是中国南方个体生命的命运之书。书中人物以种葱、做茶、扎灯笼、种花、送煤气罐、理发、唱戏等为业,从不放弃理想、尊严、善良与责任。作家努力呈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轨迹,从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发现人性之光,从广阔的民间提炼出精神的微光。

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普通人的传记,更有着十分丰富的精神指向。人物在他笔下不是目的,而是水面上的浮标,浮标之下有着更广阔的世界。

从纵向上看,作品呈现了当代中国的乡村变迁。《人间珍贵》中的时间,有着清晰的刻度,所有的人物都有共同的时代印记。他们的命运背后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变迁史。《河望两岸》中的素素,去宁波打工,回乡开书店,关照留守儿童;《晓霞里》的汪来发从温州务工回乡下种茶;《益蛛网的人》中的小美男朋友,在工地误入传销;《幻火》中的春生夫妇,服务于乡村留守老人聚集的敬老院;《十番锣鼓》中的梅远山,热衷串堂戏传承发展;《生兰之地》中的父亲,曾是村庄水利建设的领头人……打工、移民、返乡、扶贫、留守、非遗传承等时代命题,深圳、义乌、温州、泉州、绍兴、贺兰山等地方空间,共同构成了《人间珍贵》复杂的文化背景。

从横向上看,它创建了独特的民间生活场。在塑造、呈现人物时,傅菲对人物生长地



《人间珍贵》,傅菲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了散文的表达空间,使《人间珍贵》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指向。作家笔下的人物也有了丰富的肌理,有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

如此庞杂,如此开阔,如此丰富,怎样的语言才能与之匹配?傅菲尝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低声的,细小的,贴地的,带着苔藓、蕨类特有的匍匐与爬行的特点,坚韧而自由,既能借助叠声字改变情绪,又能在描写、转述与抒情中快捷切换,完成自由酣畅的书写。

所有人都知道散文是表达“我”的艺术。倘若“我”过于强大,笔下的世界容易失真;如果“我”比较薄弱,文字则容易失控而溃散。《人间珍贵》里的“我”既冷眼旁观,又适度介入;“我”与笔下人物血脉相连,却又彼此独立。这让文本有了纵深感与开阔度,让人物格外自然本真,有了特别的信度与温度。

《人间珍贵》继承了赣地文脉的现实关怀,聚焦当代中国乡村转型背景下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作者如同一位不知疲倦的地质学者,深深探入赣鄱大地的肌理,开凿出通往时代精神与普遍人性的矿脉。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景物情致与平淡日常交织”,更是一种“在地性”的哲学沉思。他将个体的悲欢、家族的迁徙、村落的兴衰,熔铸于一片片古老土地的血脉之中,让每一个平凡人都成为时代的注脚,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这块土地倔强的表情、炽热的体温以及蓬勃绵长的生命力。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主席)

新作快评

范墩子短篇小说《白马为谁而死》,《花城》2026年第1期

走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井国宁

范墩子的短篇小说《白马为谁而死》,描写了两个看似命运毫无关联,实则面临相同精神困境的中年人。一个是写作多年、著作颇丰,却始终未曾出版过任何作品的作家;另一个是独特的语言风格,低声的,细小的,贴地的,带着苔藓、蕨类特有的匍匐与爬行的特点,坚韧而自由,既能借助叠声字改变情绪,又能在描写、转述与抒情中快捷切换,完成自由酣畅的书写。

纵然两者的探索方向各不相同,但在范墩子的笔下,找到白马与写完《白马》之间,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这因白马而生的联系,像一根看似无形却力道十足的绳索,牵引着、撕扯着读者。白马是一个隐喻。它所凸显的并非表象意义上的马,而是潜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叩问。如何走出各自的精神困境,既是他们的追求与探索,也是留给读者的反思与追问。

小说中关于白马的描述,皆为虚实结合的场景。这种巧妙而新颖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品读完整篇小说后,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总觉得在文字背后,似乎还有许多想说却欲言又止的深意。这份深意,在反复品读中会愈发明显且强烈。那个如白马般的男子,是女主人公要找的白马吗?那个未完成的《白马》小说,为何让男主角搁笔不愿再写?

贯穿小说始终的,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他究竟想书写怎样一个关于白马的故事,

她又想找到怎样一个如白马般的男子?所有疑问都指向他们各自的精神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人生交集,始于对白马的探寻,也止于对白马的放弃。在他们心中,那本《白马》与那匹白马,虽载体不同,最终却都走向了“死亡”。曾经矢志探寻的白马,不过是心海中的执念,终其一生,也未能寻得想要的答案。

这两个人理想与现实的所有冲突,皆因白马而起,也因白马而落。他笔下的《白马》,是他毕生想要实现的追求,他希望更多人认识他、理解他;而她心中的白马,是能与她产生精神共鸣、实现同频共振的归宿。遗憾的是,他笔下的《白马》未能完稿,她心中的白马也早已消逝在人海中。他们各自追寻的白马,都已悄然化为尘土,不复存在,甚至未留下半点痕迹。

时代洪流中,面对个体的命运走向与精神困境,及时止损至关重要。或许不少读者认为,陕西作家的作品仍无法跳脱乡土书写的框架,或始终停留在对城乡二元发展的变迁与适应的描述上。殊不知,陕西的青年作家们已开始探寻新的叙事方式,探索如何通过作品唤醒大众、引发共鸣,助力人们走出现代生活下的个体精神困境。范墩子的《白马为谁而死》,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系咸阳市秦都区作协主席)